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与 地域文化研究

Mingqing Shiqi Wenzhou Zongzu Shehui Yu
Diyu Wenhua Yanjiu

王春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与 地域文化研究

Mingqing Shiqi Wenzhou Zongzu Shehui Yu
Diyu Wenhua Yanjiu

王春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与地域文化研究 / 王春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 - 7 - 5203 - 0044 - 5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宗族 - 文化研究 - 温州 - 明清时代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430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冯英爽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69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存在的不足	(2)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和创新	(10)
第四节 本书主要研究内容概述	(14)

上篇 明清时期的温州宗族社会

第一章 温州的地域人文环境与宗族社会的形成	(37)
第一节 地理区位：避难者的天堂	(37)
第二节 文化传承：崇儒好学之风盛行	(42)
第二章 明清时期温州的宗族组织	(46)
第一节 祠堂	(47)
一 对祠堂的重视及祠堂的特殊作用	(47)
二 祠堂修建、日常管理费用之所出	(50)
三 祠堂的管理方式和原则	(54)
第二节 族谱	(56)
一 修谱的四大目的	(59)
二 严谨、务实的修谱原则	(69)
三 对族谱管理的重视和规式化	(73)
第三节 族产	(77)
一 族产管理的规约化	(77)
二 族产纠纷处理的章程化	(80)

第四节 规训	(81)
一 敦礼秩德：规训与乡约结合	(82)
二 对规训执行的重视和严苛	(86)
三 规训对族中子弟的教化作用	(88)
第五节 族学	(92)
一 重视读书：宁减积粟千钟，也要拥书万卷	(94)
二 重视修建族塾，“以陶后进”	(99)
三 塾师聘请原则：德才兼备，德居首位	(103)
第三章 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的族内自治	(105)
第一节 进行族内自治的必要性	(105)
一 “补官治之不及”	(105)
二 瓯郡多自然灾害，唯借自治以自保	(109)
第二节 族长选择标准：“立贤不以长”	(112)
第三节 族内纠纷处理原则：“居家戒讼”	(117)
第四节 实施族内救济秉承的精神：能庇其族人，方能道济天下	(122)
第五节 约束族众行为，以睦族宁乡	(125)
第四章 明清时期温州宗族与乡里社会	(130)
第一节 热心兴修地方公共设施	(130)
第二节 以“兴仁兴让”的原则，与乡里社会和睦相处	(141)
第三节 修建义塾，以闾地方教育	(143)
第四节 匹夫化一乡，引领地方风气	(146)
第五节 “过位式车”：乡里社会对温州宗族作用的认可	(150)
第五章 明清时期温州宗族与地方官府	(153)
第一节 宗族自治权的有效行使需地方官府的支持	(153)
第二节 地方官府治理基层社会需宗族势力的协助	(156)
第三节 温州宗族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彼此需要，两相得利	(162)
第六章 明清时期温州宗族自卫与堡寨	(169)
第一节 倭寇匪患之害与宗族自卫	(169)
第二节 明清时期温州宗族修筑堡寨的代表——永昌堡	(177)

下篇 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的地域文化

第七章 婚姻文化：重视女性教化	(187)
第一节 宗族的择妇观：重视闺门之教	(187)
第二节 重视对族内妇女的夫家之训	(194)
第三节 妇女在温州宗族中起到的作用：合家睦族、教子成才	(197)
附 温州宗族妇女中的杰出代表——被尊为“女师”的郑氏	(202)
第八章 读仕文化：力学笃行，读仕之间的务实选择	(205)
第一节 重视读书和科举入仕	(206)
第二节 现实条件与科考成本	(212)
一 地理位置偏远且交通不便，增加了温州士子科考的成本	(212)
二 土薄物艰，使温州士子无力承担科考的经济成本	(216)
第三节 科举诱惑与务实选择	(221)
一 科举诱惑下的务实选择	(221)
二 力学笃行，居乡亦可及人	(225)
第九章 隐逸文化：温州多隐逸之士	(231)
第一节 隐逸者的类型	(231)
一 屡试不中而隐逸者	(232)
二 稍举不中而隐逸者	(235)
三 不屑于科举而隐逸者	(237)
四 生性喜隐逸者	(239)
第二节 隐逸之风的成因	(244)
一 经济上无力承担科考之费	(244)
二 看透仕隐得失，淡泊名利	(246)
三 追求“身心两适”，尤其是心适	(251)
四 山长水美：适宜耕读的生存环境	(253)
五 避世隐居：长久移民文化的影响	(255)
第十章 居住文化：对宗族聚居之地的精心选择	(258)
第一节 世居温州之宗族	(258)

第二节 喜爱温之山水，宜居于温者	(263)
第三节 为宦他乡，致仕后回温者	(266)
第十一章 民俗文化：温州龙舟——爱恨交织、禁而不止	(268)
第一节 爱恨交织的龙舟文化	(269)
一 温州龙舟文化的与众不同	(269)
二 温州人对于龙舟的爱与恨	(272)
第二节 禁而不止的龙舟运动	(280)
一 温州宗族对于龙舟运动的禁止	(280)
二 温州地方官府对于龙舟运动的禁止	(285)
三 为什么温州的龙舟运动禁而不止	(288)
第十二章 信仰文化：好巫敬鬼与宗族利益至上	(300)
第一节 温州的地方神信仰	(300)
一 好巫敬鬼之特色	(300)
二 宗族利益至上之原则	(305)
第二节 温州造地方神的类型	(308)
一 温州本地人，生前已被信奉为神	(308)
二 温州本地人，死后升格为神	(309)
三 外地人任职温州，被信奉为神	(315)
第十三章 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值得关注的其他文化现象	(317)
第一节 四业皆本与“量才差遣”	(317)
第二节 温俗重利，且急于近利	(326)
第三节 面子工程：“俗务外饰”与厚嫁奁之风盛行	(329)
一 “俗务外饰”	(329)
二 厚嫁奁之风盛行	(332)
结语与思考	(338)
主要参考文献	(341)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温州，声名在外，世人皆知。温州，饱受争议，评价不一。这恰恰说明，温州是一方特色鲜明、值得关注的地域。

目前学界对温州的关注、研究，基本集中于温州这方水土养育出的温州人及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温州精神方面，尤其是集中在遍行天下的温商身上，集中在温州人和金钱、温州人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上。其实，如果能够有机会亲身接触、研读一些记录温州历史和文化的文献资料，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温州并不是一片文化的“荒漠”，而是有着自己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发展脉络和特性。虽然温州的地域文化从来没能占据中国文化大系的主流，但确是其中特色独具的一支。

宗族作为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社会组织，与之相关的内容足以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与之对应的诸般社会现象。对于区域史研究而言，即可以透过宗族的视角剖析出该地域的社会发展与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性。

关于明清时期中国宗族的发展情况，冯尔康曾言：

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遍出现，尤其盛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①

可见，明清时期宗族不仅在温州存在，而且处于盛行的状态。杨国桢在为郑振满著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作序时曾指出：

^①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福建的家族组织是东晋以降陆续南迁的中原汉族移民带来的，由于长期处于边区，保留了较多中古中原家庭的遗俗遗制，同时又适应山、海的新环境独立发展，形成区域性的特色。^①

温州地处浙南闽北之交，在很多方面和福建有相似共通之处。所以，杨氏的结论亦可适用于温州，即温州的宗族组织和宗族社会亦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因此，将明清时期温州的宗族社会和相关的地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颇值得探寻、挖掘一番。

笔者硕博阶段曾研究过北朝隋唐的士族群体，侧重点在于这个群体与社会的互动，在于对他们文化特征的把握。来温州工作后，因为工作需要，转做温州地域史方面的研究。随着对地方文献资料的不断收集、研读及工作中一次次到温州各地开展实地田野调查，日渐发觉关于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和地域文化方面的资料比较丰富，特性比较鲜明，遂决心开始这方面的资料收集及研究工作，这样笔者硕博阶段研究的一些方法和基础也可以派上用场。经过几年的资料收集、分析，实地调研、访谈的积累，对于研究主体的思考和认识逐渐明晰、成型，最终成稿，遂将本书名之为《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与地域文化研究》。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存在的不足

如上节所言，学界关于温州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从经济的角度剖析温州人、温州精神、温州地域文化特性等方面。相比之下，直接以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及相关地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甚少，所以本书在学术史回顾部分是以学界关于温州宗族社会的研究成果为对象，并分类述评如下。

在已有可见研究成果中，直接以温州宗族为研究对象者，仅有陈彩云的论文《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陈氏在文中指出，宋代以后的地域社会与理学的关系日益密切，随着元代理学在温州的深入传播，温州士大夫不仅接受并进行了社会化实践，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行宗族建设。且自宋代以来，温州

^①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国桢所写“序言”第1页。

就是宗族势力颇为发达的地区。到元代时,温州士人因为仕宦不畅,绝大多数沉居下僚,居于乡里,所以他们更加注重地方宗族建设,如修撰族谱、建设祠堂、兴置族产、兴办族塾、救济族人等。但元代温州宗族祭祀还处于不规范阶段,这从其祭祖场所不固定、祭祖年代不确定、义田设置稀少等方面可以看出。所以,陈氏认为元代温州的宗族建设和宗族制度还处于不成熟阶段,是温州宗族走向明清时期全面繁荣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同时也影响到明清时期温州的宗族建设。

宗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长,而且涵盖内容非常复杂的社会组织,宗族建设涉及多个方面,诸如祠堂、族谱、族田、族学等。

学界关于温州宗族具体建设内容进行研究的成果,有李翔的《浙江祠堂文化的比较性研究——以浙江淳安和温州两地为例》(《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2年第2期)。李氏指出,因为祠堂是宗族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直至今天仍然重视血缘和宗族关系的农村社区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所以其通过调研走访淳安、温州两地共计5个乡镇的8个祠堂,总结、对比、分析了淳安和温州在当今祠堂文化建设方面的不同。李氏认为淳安模式的祠堂文化建设,最根本的在于它的传统性,在于它注重敬奉祖宗、教育子孙的宗族文化内涵建设和延续及带有传统审美情趣的民俗活动的开展。而温州模式的祠堂文化建设则在于它传承性和创新性的结合,其不仅会在传统节日和特殊的日子进行宗族活动,还会利用祠堂来开展现代文化活动,进行各种文化表演。本书认为,这种将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温州祠堂文化建设模式不仅可以取得不错的凝聚宗族效果,也充分体现了温州地域文化中将创新进行到底的文化特性和精神。

蔡克骄的《明代温州祠堂祭祖述论——以温州市龙湾区项氏、王氏、张氏家族为例》(《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通过对《项乔集》《王叔果集》《张璠集》及相关族谱中有关祠堂祭祖活动的研究,指出明代温州地区士大夫的祠堂祭祖活动颇具特色,具体表现为在祠堂祭祖方面持有的“一本观”宗族观念和“礼以义起”的宗族改革观。“一本观”宗族观念讲究同根、同源,可以起到避免本枝紊乱、源流混淆的作用,可以为敬宗收族、订家训、修族约、建祠堂、筑城堡、立私塾、置义田等宗族活动奠定思想基础。“礼以义起”的宗族改革观,是指在处理宗族具体事务时,以项氏、王氏、张氏等为代表的明代温州宗族并不拘泥于之前固有的宗族礼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其灵活之处在

于,在与礼法基本思想不相悖的基础上,也要考虑情、义、功、德等因素。本书认为,这样的宗族改革观念,能够很好地处理宗族事务,收到敦宗睦族的效果,也体现了温州地域文化中灵活、务实的特性。

丁红的《温州家谱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8期)是研究温州家谱文化的成果。丁氏指出,1949年以后,浙南地区,主要是温州地区,始终存在着纂修家谱的独特社会现象,但由于行政职能部门的低调处理以及纂修的隐蔽性加之家谱的私密性,外界基本不清楚其具体情况。丁氏通过对温州纂修家谱历史与现状的调查及著录项目表的统计分析,探讨了温州家谱的地区分布、纂修年代、姓氏结构、续修规律、版本特点以及社会化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展示了温州地域家谱文化一直绵延不绝的特色。

在温州宗族社会中生活着很多的著姓宗族,对他们进行个案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

吴仁安的《浙江温州龙湾地区明代的著姓望族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之作用与影响述略》[《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指出,浙江温州龙湾地区在明代由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文化较为昌盛,涌现出诸如二都黄氏、李浦王氏、永强普门张氏、七甲项氏、英桥王氏、梅头东溪姜氏和前街陈氏等众多望族。吴氏认为,这些明代望族中的精英不仅对于温州龙湾当地,对温州之外的国内其他地方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也均产生过重大作用与影响。吴氏在文章最后指出:

综上所述,可见明代温州龙湾望族中的精英人士,他们的思想、学说与业绩、精神,其作用重大、其影响深远,有的甚至影响至今。基此原因,本人认为我们今后理应加强对明代温州龙湾望族(在时间上,不妨延伸至清代,亦即成“明清时期”;在空间上,则不妨从龙湾区扩充到温州全市乃至明清时期的“温州府”全郡)历史的研究,以资我们借鉴、利用,来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文明、新文化。^①

^① 吴仁安:《浙江温州龙湾地区明代的著姓望族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之作用与影响述略》,《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吴氏文末之主张，与本书的研究主旨不谋而合，也算得上英雄所见略同！而且吴仁安在文中提到的温州龙湾的这些望族也是本书会涉及的研究对象，他们作为当地的代表性宗族及宗族中涌现出的代表性人物，如英桥王氏之王叔果、王叔杲，晋门张氏之嘉靖时官至内阁首辅的张璁，七甲项氏之项乔，李浦王氏之王瓚等，都为温州宗族社会及地域文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是本书进行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和地域文化研究的钥匙，正如吴大琨指出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家族一直在社会的发展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要弄清楚某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情况，就必须弄清楚这一地区的一些代表性家族的情况，两者是分不开的。^①

姚周辉、郑秋枫、林佳、王飞飞的《试论永嘉岩头金氏宗族村落文化的传承动力》（《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与其他学者多从宏观视角研究村落宗族文化长盛不衰的情形不同，该文侧重从微观视角以金氏宗族村落文化为个案深入剖析了其村落宗族文化传承的动力。文章认为，可将宗族村落文化传承的动力概括为三个方面：内部驱动力，简称“内驱力”，即村落家族所承载的族内功能；外部驱动力，简称“外驱力”，即村落家族所承载的族外功能；内外驱动力的互动，则是指得到官方认可的宗族组织与代表官方的社会基层组织的相互作用。岩头金氏宗族的村落文化正是在内驱力、外驱力、内外驱力互动的共同作用下得以传承。其中，该文关于内外驱动力互动的论述，和本书中温州宗族与地方政府互动关系章节的内容，在精神实质上相一致。

姚周辉、何华湘等著《宗族村落文化的范本——温州永嘉岩头金氏宗族村落文化研究》（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是以温州永嘉岩头金氏宗族村落文化及其变迁为研究对象，内容涵括岩头金氏宗族村落的历史沿革、村落布局、水利工程、耕读文化、商贸文化、宗族组织文化、带有区域共性及金氏宗族特色的民俗文化等各种文化事象及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岩头金氏宗族村落文化发展与演变的特点和传承动力（即前面《试论永嘉岩头金氏宗族村落文化的传承动力》一文之内容），推测

^① 吴大琨：《笔谈吴文化》，《文史知识》1990年第11期，第10页。

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探讨其对当今新农村建设的启发作用,以及如何对待宗族村落文化和如何保护与开发古村落等问题。该书对于永嘉岩头金氏宗族的全方位、深入化的个案分析,在很多方面给本书的研究以启示。

研究温州的宗族社会和地域文化,必然涉及移民元素,这在本书的论述中将多次提及。在学界关于温州移民文化的研究中,主要有如下成果。

徐定水的《历代福建迁温人口姓氏述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认为温州境内的早期居民自汉建元三年(前138)东瓯王率众内徙庐江郡和元封元年(前110)东越国除民再次内徙江淮间后,瓯地几成废墟,遗民甚少,其原始人口姓氏俱都衰落无闻。此后,温州人口陆续从各地迁徙而来,其中以福建最多。唐代以前,谱牒散佚,记载缺乏,闽民迁温的具体情况难以稽考。从唐代开始,有关史志、谱牒等记载逐渐增多,闽民迁温的情况亦变得有迹可循。在唐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入闽,而温州无战事,导致闽民流迁来温尤多。五代十国时期,闽主王审知死后,继承者为政暴虐,相互攻杀,内战不休,而温州在吴越钱氏统治下,社会相对安定并生产发展,因而吸引大批闽民来温。宋时,闽民迁温比上代为多。尤其是南宋乾道二年,浙南沿海遭遇特大海溢,“浮尸蔽川,存者什一”^①。温州郡守传檄要求福建移民补籍,此后几年大批闽民陆续迁温。元、明、清各朝,闽民迁温的记载仍不绝于史。其中有避王朝更替之乱、避倭寇之乱和清初“迁界”等情况。清末开埠后,亦有闽民来温经商占籍。综上所述,历代闽民迁温以宋代为最多,其次是五代、唐代、明代。在入迁人口中,以闽省赤岸为最多,几占闽省迁温人口的半数以上。这些移民是温州居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共同推进了温州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林亦修的《温州唐末五代移民的社会背景述略》[《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指出,温州在唐末五代出现了人口大量迁入的情况,且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100年(878—978)。关于移民持续迁温的原因,林氏分析有三:一是黄巢起义军在南方的活动(878—879)导致温州周边地区多被扰掠,特别是闽东;二是在朱褒割据温州的二十多年(881—902)时间里,温州与周边州县的动荡相比,局势相对稳定;三是闽主王审知于925年死后,其继任者内战不断,民心难安,而温州在

^① 徐定水:《徐定水集》,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28页。

吴越钱氏统治下，局势相对安定。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才出现了唐末五代周边居民持续迁温的情形。这些移民构成了温州居民的主要姓氏，构建了温州村、社、乡、都结构的总体布局，实现了温州乡村从“野”向“文”的转型。

徐氏、林氏的研究，内容有重合之处，着重点在于对温州移民迁入历史背景和原因的分析。

陈佳佳的《温州姓氏文化综述》[《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则对温州历代从外地迁入的姓氏进行了研究。根据陈氏统计，温州所有姓氏中以从福建迁来的姓氏最多，而且陈姓是迁入人口最多的姓氏。此外，陈氏也指出在温州姓氏文化方面存在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大姓聚族而居，各族大都设有祠堂，修有族谱，而且以苍南县最为典型，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温州宗族社会的发展情况。

温州宗族对于地域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即有从宗族与当时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展开研究者。

华东师范大学2005届研究生李世众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温州权力关系格局透视——以士绅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该论文于2006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以《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为名正式出版)主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以发生在晚清温州的若干事件为叙述分析对象，集中对晚清温州地方官与士绅的关系和士绅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揭示了地方社会权力关系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对这个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予以一种历史性诠释。

在李氏专著中，明确涉及温州宗族方面的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第一章“温州的生活世界”之第三节“乾、嘉、道时期的地方权力关系”，在该节中，李氏认为宗族组织在当时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格局变动中发挥了“减震器”功能。即清朝中叶，政府在地方治理中无视民众的价值观念及其社会组织原则，导致社会秩序恶化，地方治理出现危机。而能够使地方社会秩序恢复的，正是宗族组织起到的社会“减震器”作用。李氏指出，学术界虽然都认同宗族组织缓和阶级对立的作用，但一般都把起作用的机制理解成族内的慈善行为。可李氏经过研究发现，在社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儒家意识形态对绅富的感召力消失殆尽，贫民与绅富双方是通过博弈达到力量平衡，而宗族组织所起的作用是为两者提供了谈判的平

台。李氏进一步分析指出,宗族组织能够化解危机的真正原因,既不是慈善,也不是暴力,而是宗族集体本身具有集体生存理性和集体安全理性,而宗族具有的这两点正是地方社会的稳定因素。

李氏著作中涉及宗族内容的另一部分,在第二章“19世纪中叶地方政治生态的变化——透视金钱会事件所见”之第五节“宗族是地方势力角逐的现成工具”。李氏在该节指出,在温州乡土社会村落中,单姓村占大多数,其余村落至少也是数姓聚居,宗族势力异常强大,宗族组织相当严密。在金钱会和瞿党的反叛中,无论是会党还是官绅的团练都利用了宗族这个现成的组织,以致“通族皆盗”或“通族皆义民”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面对地方势力凭借宗族进行的社会动员,国家对这些进行反叛的宗族进行了严厉镇压,对有些宗族甚至施以毁灭性打击。

本书在研究中也十分注重宗族与地方官府的互动关系,认为宗族与地方官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存、难以割舍的必然联系,他们只有相互结合、彼此倚重,才能两两得利。

方坚铭的《“永嘉场”地域文化研究:以明代永嘉场为考察中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是海内外首部以明代永嘉场为考察中心,系统对永嘉场地域文化进行研究的专著。该书不仅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永嘉场地域文化的特色,而且初步总结、探讨了明代永嘉场地域文化崛起的原因,并围绕明代永嘉场出现的四大宗族,即李浦王氏、普门张氏、英桥王氏、七甲项氏展开研究。方氏著作中关于这四大宗族迁徙历史、宗族建设(包括修建祠堂、修订族谱、制订族约规训、兴建族学、进行宗族自卫等方面内容)及宗族家风对于族内成员仕宦品格、人生价值观和精神风貌影响等方面内容的研究,和本书的研究旨趣相一致,为本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前期借鉴。

温州大学2012届邓苗的硕士学位论文《宗族与地方社会的文化互动——以浙南四村为中心的考察》,则通过对温州地区福佑村、宁村、睦州垟村和丽水青田县龙现村四个村落的实地田野调查,指出宗族文化在时代变迁中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概括为由传统社会的弥散型宗族演变为当代社会的点缀型宗族。

最后是陈学文的几篇文章,均收入《陈学文集》。这几篇文章虽然没有明确以明清时期的温州宗族和地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但和本书中要阐述的某些具体问题,如士农工商四业皆本的择业观、宗族所修堡寨的代

表——永昌堡等内容相关。陈氏文集中的《明中叶以来“士农工商”四民观的演化——明清恤商厚商思潮的探讨》指出，到明朝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国内外商贸的蓬勃发展，江南市镇的勃兴，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商业地位的变化，反映到意识形态，则是士农工商四民等级观的逐渐变化，陈氏将这一变化过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依次为：四民异业同道、各安生理的治生说、儒商相混、恤商厚商、工商亦本业，并依次对这五个阶段进行了阐述。又《项乔的人品与“各安生理”的四民观》一文，对项乔产生“各安生理”观念的思想根源，从王阳明理学、永嘉学派的事功说、“实行为生”的社会现实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万历〈东嘉英桥王氏族谱〉的初步研究》则对英桥王氏族谱的修撰过程、代表性人物、族居地——永嘉场、宗族修筑的抗倭自保工事——永昌堡等，进行了介绍。^①

回看上述学界关于温州宗族社会与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大家对于温州宗族社会的诸多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涌现出的代表性宗族、宗族中的代表性人物、宗族与地方社会和官府的互动关系、移民文化、宗族建设、传统宗族村落的传承和演变等，这些成果为本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前期借鉴和基础。但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与温州宗族社会丰富的内涵和与之相关的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相比，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具体呈现的精彩空间。尤其是与学界对温州周边地域宗族的相关研究成果相比，学界关于温州宗族社会与地域文化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不足，更为明显。

在今天的行政区划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温州东临大海，南面接壤福建，西面是历史上的徽州，北面是曾经的江南。目前学界关于福建、徽州、江南，这三个地域宗族的相关研究可以用中外学者、大家云集、硕果累累来形容。下面略举其中的部分成果，以示说明。如关于福建的研究有[英]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陈支平的《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等^②，关

^① 这几篇文章分别见于《陈学文集》，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534—544、583—588、589—593页。

^② [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于徽州的研究成果有唐力行的《徽州宗族社会》和《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赵华富的《徽州宗族调查研究》、王振忠的《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和《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陈瑞的《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等^①，关于江南的研究成果有吴仁安的《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冯贤亮的《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徐茂明的《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陈江的《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等^②。至于其他学者的诸多相关研究论著和论文，就不再一一赘举。相比之下，处于福建、徽州、江南中间的温州，因为地缘、学缘等因素的关系，关于宗族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具体到关于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和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少，属于未被学术界充分关注的“弱势地域”。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将目前学界关于明清时期温州宗族与地域文化研究成果的不足概括为三：一、没有将明清时期的温州宗族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二、没有对这一时期温州宗族社会中的地域文化进行梳理性分析、研究。三、没有像学界对于福建、徽州、江南的研究那样，对于宗族的内部组织结构、宗族社会变迁、宗族中的特定群体等进行专项的、深入化的、多学科性的审视和研究。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和创新

本书以明清时期的温州宗族社会及在其中出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化事象作为研究对象。篇章结构安排为：将全书内容分为上篇、下篇两部分，上篇以明清时期的温州宗族社会，下篇以明清时期温州宗族社会的地

^① 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唐力行：《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赵华富：《徽州宗族调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陈瑞：《明清徽州宗族与乡村社会控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